

杂汤。

何申兄，这就是留存在我们记忆深处的一生也难以磨灭的世俗生活啊。

以同乡的名义。

2003年5月28日写于天津



何申的好戏

关仁山

熟悉“三驾马车”的人，都知道何申、谈歌爱唱戏。唱京剧是这二位老兄的拿手戏。做为京剧票友的谈歌就不提了，何申兄的嗓子很豁亮，唱起来是有板有眼的。一次在北京开会，中国作协翟泰丰书记与谈歌、何申唱京剧《智斗》，何申唱的是阿庆嫂，何申兄唱的一段女腔，引起了满堂喝彩。我故乡的一位仙人说，装男像男，装女像女的人大富大贵。果然，何申兄事事顺遂，好戏连台。

何申兄生一副富贵相。浓眉大眼，虎背熊腰，说话却极和善。他自称是我们“三驾马车”里的胖马。与其说胖马，不如说是驾辕马。他既是我们的老兄，又是我们的主心骨和带头人。何申兄既能做官又能作文，在文坛也不多见。他当过承德地区文化局长、地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，后来又是《承德日报》社社长。他对我说，他这个社长不是挂名的，而是实实在在的人财物一把手。他白天工作，而写作时间只能挤在晚上了。他在单位宣布一个规矩，有事在单位办，谁也不能晚上找我，敲门也不见。果然晚上没人敢打扰他。他家门口写着“请勿打扰”。后来，我听别人说，单位里求他办事，不给他送烟送酒，因为送了，也被何申退回来。碰上这位刀枪不入的领导，手下人很为难。后来有些聪明人，发现了秘

密，何申也是“吃礼”的，他吃另外一种礼。有的记者从基层听到一些有趣的好故事，就兴致勃勃地跟何申讲，何申听得入了迷，还拿小本子记上，不久就写进小说里了。这个讲故事人的一些小事，何申就开了绿灯。慢慢地，求何申办事的人都给何申送“故事”礼物。

何申兄是个故事篓子。开会碰到一起，他总是讲一些新段子。荤的素的都有。何申兄讲逗乐的故事不动声色，他不笑，等大家都笑开了，他才微笑起来。何申小说的幽默，源于他深厚的生活积累。他写乡镇干部系列，有人以为何申当过乡镇干部，其实他没有当过一天的乡镇干部。他是在天津海河边长大的城里人，上山下乡年代，使他一头钻进承德地区的山沟子。天津调老何回城做文艺干部，老何太爱这块山乡了而没有离开，时光已将他变成了地道的山乡汉子。他小说中的一些故事，大多是他亲身经历。

何申说他在1969年春节之后，由天津到承德山区插队的。他插队的那个村是满族聚居村，在村里生活、劳动，也为后来创作打下根基。他特别留意观察满族妇女的装束，女人头发梳得很特别，凡是结了婚的妇女，头发都是光溜溜地梳向两边，在脑后打一个弯，像公鸡尾巴一样翘起来，特别有意思。他住在社员家，吃在社员家。

秋收的晚上，队长敲钟分粮，他就夹条口袋去场院，分粮后去村口的石碾子上磨成面，下锅做饭，吃饱喝足，就到村里能说会道的山民家串门，听他们讲故事。这一干就是五年。

按常理说，何申是知青作家，有人问他为什么不写知青生活小说？何申这样对我说：“我没有把自己当知青，而是一个农民。像梁晓声、叶辛等知青小说名家，写北大荒的风雪，贵州苗寨风情，是那么的有气势，那么美丽丰富。这样的环境和感受，我们这里没有，没法与那些地方比。我只能写农民日常平凡的劳动。”这就形成何申特色的文学作品。后来他进了承德市城里，当地区文化局长，利用职务之便，把承德地区二百多个乡镇基本跑了一遍。有一年年底下乡，汽车行至半山腰，翻到沟里。何申福大命大，连伤也没有，爬出来，喊老乡们把车抬上来，司机问他还往山里走不走，何申呵呵一笑，阎王爷不收咱们，咱就照旧赶路。就是这次下乡，他的历险感动了基层干部，为他讲了一些县城年前年后的景象，才使他写出了《年前年后》这样的精品。

有一次，何申在乡下看到干部审一伙赌博的农民。何申就去看。乡干部问赌徒，你们为啥总赌？赌徒无奈地说，我们的手痒痒。乡干部就让人拿来盆子，赌徒们蹲在地上往盆里抓土！赌徒们拼命抓土，手抓破了，委屈地问，这是他妈啥政策？乡干部说，这是他妈土政策！何申一听就笑了，记在心里，将这个独特有趣的细节写进了电视剧《山乡女法官》里，收到很好的效果。

前几年，何申兄又应著名喜剧演员赵本山之邀，写了二十集的电视连续剧《一乡之长》，这是赵本山主演的《一村之长》的续集。此剧由赵本山主演，拍完，已与观众见面。在涿州开会，作家李功达逗何申说：“你贪污了朝廷那么多金条，还写什么小说啊？”何申愣了愣，就笑笑。可也是，后来何申走哪儿先声明，我不是那个和珅。那个和珅太臭了。我和谈歌看他天真的样子，也乐了。何申一本正经地说：“咱是凭劳动拿稿费，可不能学那个和珅！”

何申兄有一个幸福的家庭。何申兄跟我谈起足球，便说起家庭。他很少与妻子拌嘴，可一看足球，看到半夜，因为何申总爱评论几句，不免

就与妻子发生争吵。一看足球就吵，后来何申就忍着不看了。本来挺和睦的家庭，不能让“足球”插足。我听后直笑。

在“三驾马车”里，谈歌兄是一个散淡的人，爱喝酒，一动感情就容易失控喝多。一般情况下，我能管得住谈歌，特殊情况下，谈歌不听我的，可只要何申兄说话，谈歌便不喝了。那次在北京开会，谈歌喝多了，醉着，还命令我将桌上的两瓶“二锅头”打开再喝。我到另一屋将何申喊来，何申兄不恼不怒，和颜悦色地劝说一番，谈歌醉着也不撇何申的面子，就答应不喝。何申一走，他又喊上酒了，何申朝我递眼色，我就明白了，把酒瓶藏起来了。谈歌勾着腰到处找酒，没找着就躺下睡觉。我知道何申兄是怕谈歌喝伤了身体。谈歌醒后对我说，何申大哥是咱们永远的大哥，他对咱们是呵护。时间久了，这种爱护就变成了一种情感的力量，彼此信任和鼓舞。

在文坛，三个文人能够永久地捆绑在一起，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，这份情谊越来越近，是非常难得的。我们彼此都很珍惜。当然了，有一些人不知出于什么样的目的，在我们三个人中间说点什么话，说那个人的作品更好，哪个人的作品不好等等，甚至还有一些挑拨离间的言语。话传到何申那里，他很平静地说：“我们哥仨的作品各有特色。我的作品幽默，谈歌的作品激烈，小关的作品清新而有情趣。还有我们三个人，这是难得的缘分，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彼此并不熟悉，是文学让我们结缘，而且我们关注时代，关注基层人民，文学上有着共同的理想和志趣。另外，我们三个人还有一个特点，为人都很正直、坦诚。我想啊，在以后很久的日子里，如果我们的作品读者记不得了，但我们三个人的友谊却留下来了，这个绰号留下来了，这比什么不珍贵呢？”我们听到何申的话，更加感动。人与人相处总是有些问题的，也不能绝对超脱。但是，这就看我们的生活态度了。我们之间如果没有一点小插曲，也是不可能的。记得有一次，在北京铁道大厦开会，何申兄走到那里都回想过去的创作，同着我和谈歌，很是感慨地说：“当年我们的绰号是二何，你知道二何是谁吗？我和女作家

何玉茹，后来哪成想杀出你们两小子！”说着就憨厚地笑了。说者无心听者有意，谈歌心里有些不悦，何申走后他对我说：“这老何要拆车了，他怎么不管啥场合都说二何呢？”我笑着劝说：

“大哥说的也是事实，咱省在涿州开过一个二何作品研讨会，二何的称号的确叫过一阵。”我们从北京回到石家庄继续开会，晚上，何申提议说：“在北京开会乱哄哄的，也没好好坐下说说话，咱哥仨也好长时间没见面了，这心里还挺想的。”听了这话，我们心里热乎乎的。我们三个人就找了个酒馆吃饭。喝了一阵酒，何大哥激动了：“咱哥仨可是一辈子的交情啊！吃完饭，咱仨人去串个门好不好？”我问他去哪儿？何申爽快地说：“到何玉茹家里看看！在咱这个圈里，何玉茹小说写得好，还是个很好的人啊！”谈歌这才恍然明白了，何大哥是个重情谊的人，他敬重何玉茹的人品和文品。瞬间就真正理解和沟通了。后来，我在北京开我们仨的长篇小说研讨会的时候，有个别专家说，“三驾马车”是个阶段性的产物，以后要各跑各的了。最后让我们三个人分别发言，谈歌私下里给何申递了个纸条，我看见纸条上写着：不能拆车，只要有你们何大哥在场，你永远要代表我们哥俩发言！何申看见后明白了，他代表我们发言，后来在许多场合，都是何申代表我们发言。

何大哥对我的创作也是很关心的。去年夏天，我们一同到涿州开会，我当时正在北京怀柔赶写长篇小说《天高地厚》，何大哥听说是写“十六大献礼”书，就为我捏着一把汗，他叮嘱我一定要注意身体，二要保证质量。同时还有一个担心，仅仅还剩下三个月的时间，要写近五十万字的长篇是不是能够写出来呢？我看出他的担

忧，其实，我心里也没底。后来，我的书如期出版，他在我的这部长篇小说研讨会上，由衷地说：“我先为我的小老弟高兴，书不仅如期出版，而且还有一定的质量！当时，我真为他捏着一把汗啊！”我从何大哥的话语中，感觉到他火热的心。弟兄们有了一点进步，他就真诚地祝贺。我们想啊，在文学圈里留住真情谊多好啊！

“文人相轻”应该成为历史，我们崇尚的是“文人相重”。我们不仅是三个人相重，而是广交所有文友。我们“三驾马车”有很多朋友。互相尊重互相勉励。我们就不寂寞了，我们就不孤独了。正如一个朋友说的人生三境：“好友者，不以生死易心；嗜书者，不以忙闲做辍；为文者，不以逆顺改志。”

何申是全国人大代表，走到哪里都问一些社会问题，记在小本里留着开人代会上送提案。记得我们去南方福建参观访问，何申在买车票困难时掏出了“代表证”，得到列车长的特殊照顾，躺在卧铺上，何申兄对我说：“这份优越待遇是好，可咱也得替老百姓说点话。”后来在“人大”的各种会议上，何申送上了好多提案，其中有出版法方面的，也有婚姻法方面的，还有农民负担过重的问题，他都很认真地送上去，还盯着上面的反应。这不光是一个作家的责任，还有心灵或精神上的需要。写出反映农民的好作品，是何申的愿望。他在一篇文章的结束语中说：“我们伴随着中国农村走过了这一重要时期，未来肯定是十分美好的。若干年后，当人们回想起这一段日子时，如果有人提到，当年有个姓何的写过不少关于乡镇干部和农民的小说，拿来再看看，我就十分满足了。”

本栏责编 李春风